

濟寧地委 黨史資料

第一輯



中共濟寧地委黨史資料征集小組編

济宁地区党史资料

第 一 辑

说 明

一九八三年元旦之际，我们将《济宁地区党史资料》（第一辑）捧献给读者，作为节日的非薄礼物。

《济宁地区党史资料》是中共济宁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辑出版的内部刊物。主要目的是记述济宁地区党的革命历史和革命前辈英勇奋斗的业绩，以便永存万世，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激励人民，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贡献力量。同时作为资料，以便于党史工作者和有关党史研究部门之间交流、探讨、使用，并为今后编写地方党史积累资料。

《济宁地区党史资料》不定期出刊，一九八三年内准备再编辑两辑。每辑内容主要是刊登、反映有关济宁地区党的斗争历史的革命文献、资料、图片、回忆录等。本辑（第一辑）共十二篇，约十万字。主要内容有记述影响波及全省的山东曲阜二师早期党的活动，以及全国著名的战斗英雄郭继胜烈士的传略等。

我们在编辑过程中，力求准确、真实地反映历史本来的面目；但因我们的政治理论水平有限，所掌握的资料不足，再加上时间仓促，缺点、错误和遗漏之处在所难免。因此，恳请革命前辈、党史工作者、广大干部和群众批评指正。

中共济宁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九日

目 录

楚图南同志回忆曲阜二师党的活动.....	1
回忆曲阜二师及曲泗泰宁党的斗争.....	3
刘弄潮教授回忆当年在曲阜.....	17
记邹县第一个党员韩维密同志.....	24
关于湖西地区斗争情况的回忆.....	36
邹西地区抗日斗争概况.....	50
沛滕边区县我党力量的发展和 对敌斗争的形势.....	66
抗战时期党在金乡县的情报工作.....	76
此路不通	84
在战火中成长.....	90
船头日记	106
羊山集之战	118

楚图南同志回忆曲阜

二师党的活动

我是楚图南，今年八十三岁，云南省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

一九二六年，我在哈尔滨市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东北的地下党组织遭到大破坏后，在东北工作的吴丽石同志调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由吴丽石同志介绍，我到了山东泰安省立第三中学教书。一九二九年下半年，通过党与当时任山东省教育厅督学的张郁光（一九三〇年八月，张调任曲阜二师校长）的关系，我到了曲阜省立第二师范教书。张郁光那时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思想进步，赞助革命，他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但他没有把我暴露。我那时已经知道二师有我们党的地下组织，但却接不上关系。那时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是我们现在的青年人所能想像不到的。那时接头既没有现在的介绍信，也没有真实的姓名和地址，通过暗号——一柄手杖或一本书，接上头就谈话、联系工作。

我到了二师后，就以教文史课作掩护，做一些传播革命思想的宣传工作。我在青年考生中以钻研业务为名，组织了读书会、讨论会、学习会，借以引导学生分析当时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形势，进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社会主义。参加读书会、讨论会、学习会的人数，以探讨问题的政治色彩的浓淡、深浅来定。讨论的问题深一些，马列主义思想浓一些的，参加的学生人数就少些，反之就多些。一般的问题，人数就更多一些，有时候是全校的学生都参加。一九

二九年冬，我从上海带来了很多进步书籍，装了满满两柳条箱，带回二师给学生看。后来我去济南时，这些书籍全部留下了。我在二师期间按照当时上级组织的安排，不过问组织发展工作，只在青年学生和部分教师中进行进步的宣传和教育工作。通过政治活动，学校地下党组织发现进步的学生，逐步吸收到党内来。

我们在曲师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国民党曲阜县党部要抓我，在张郁光校长的帮助下，我于一九三〇年下半年离开曲阜，到了济南省立第一高中教书。我离开曲阜后，有二十多个平时与我关系密切的学生在学校呆不下去了，也相继离开了该校。记得李沾吾就是其中的一个，李解放后曾任中苏友协副秘书长。他身体不好，现在可能离休了。我离开二师不久，党就派了任白戈同志到二师，继续进行工作。

到了济南省立第一高中后，我在全校作了有关“五四”运动的报告，鼓动青年学生起来反帝反封建。当时任山东省教育厅长的何思源知道了，他把我在泰安、曲阜的事情联系起来，下令通缉我。当时第一高中的校长张默生是赞助革命的民主人士，他便帮助我离开了济南。当时胡也频、丁玲也在第一高中教书，他俩也和我一起离开了济南。

回忆曲阜二师及曲泗 泰宁党的斗争

编者按：管戈同志，又名管毓筠、管竹溪、管明轩。今年67岁，山东新泰县人。一九二八年进入曲阜二师上学，一九三二年在曲阜二师参加共青团，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八年一月，参加徂徕山起义。现任山东省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下面是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二日、二十四日管戈同志两次谈话的记录。

我是一九二八年下半年考入曲阜二师学习的，是二师六级的学生。

我听说早在北伐战争时期的一九二六年，曲阜二师就有我们党的支部，有二十多名党员。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二师，共产党和国民党同时存在，共产党员的身份和活动都是公开的。蒋连萼同志就是那个时期入党的。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右派大肆反共，屠杀共产党人，二师共产党的活动才逐步转入地下。一九二八年三月，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对二师进行了大逮捕，不少共产党员师生被逮捕，蒋连萼同志闻讯逃走，才幸免于难。顿时白色恐怖笼罩了二师校院，党的支部被破坏，剩下的学生党员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一九二八年暑假后，宋还吾继任二师校长。他是北京大学毕业生，崇尚鲁迅，是个具有革命倾向的国民党员。他到任后，积极提倡民主，反对封建，提倡新文化，反对旧礼教，孤立打击顽固势力，极力扶植进步力量。他带来及新聘了一批

进步教师，成立进步的学生会，建立工人夜校。大量购置进步书刊，公开支持教师讲授马列主义、唯物史观。同学们则接受新思想，钻研新科学，学习新文化，蔚然成风。党的地下组织也有新的发展，党员人数增加了十几人之多。

由于二师在中国封建文化的鼻祖孔夫子的故乡办学。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二师师生们反对孔府封建势力的斗争就始终没有停止过。到了一九二八年，二师师生们的反孔斗争更加高涨，他们涌到孔府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高呼“打倒孔老二”“反对旧礼教”的进步口号。并用粉笔、铅笔把这些口号写满了曲阜的街头巷尾，连孔庙、孔林、孔府的墙壁上和树木上都满眼皆是。为了将反对封建势力的运动推向深入，二师的师生还在一九二九年六月演出了话剧《子见南子》。话剧一演，满城哗然，震动异常。孔府的人看了顿时惊慌失措、暴跳如雷，他们借孔家六十户族人的名义，联名写信给南京政府伪教育部，控告二师校长宋还吾。蒋介石下令镇压，遂终于酿成轰动国内外的《子见南子》案。结果宋还吾校长被变相撤职，大批进步学生被开除，不少进步教师被迫离校，进步力量遭受严重摧残。

一九三〇年八月，张郁光来二师担任校长。他延聘了不少进步而有才学的教师，如共产党员任白戈、陆建平、刘弄潮等。他支持教社会学的教师任白戈、刘弄潮等在课堂上大讲马列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图书馆也进行了扩充，购置了包括《资本论》在内的大量进步书籍。当时，学生们手不离《国家与革命》、《铁流》、《毁灭》等进步书籍，口不离鲁迅、郭沫若、巴金等进步作家。甚至党的文件、刊物也在学生中阅读、传播。那时的曲阜二师，爱国、民主、进步的气氛充满整个校院。

一九三一年夏，五级一班的同学程照轩和裴康增在泰安由鲁宝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俩回校后又征得张郁光校长同意，调原二师毕业生曹德仲来校任图书馆长。这年秋，他们三人建立了党支部，程照轩任支部书记。先后发展了元善青、徐干辰等十几名党员。共产党员学生作风正派，思想进步，处处做群众的表率，得到大多数学生的拥护和支持。在一次民主选举中，程照轩被选为二师学生会主席。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张郁光校长支持下，师生们罢课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当时，二师出现了两个派别，一个是以共产党员、教务主任陆建平和学生会主席程照轩为首的抗日派（称之为“干部派”）；一个是以国民党员、训育主任张彝堂为头子的托派（称之为“取消派”）。一派力主抗战，一派积极反共。在程照轩、陆建平的领导下，组织发动广大师生展开了与“取消派”针锋相对的斗争，经过辩论说理，把张彝堂等人的谬论驳得体无完肤，把他们的罪恶行径充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张彝堂等人威风扫地，在二师站不住脚，只好灰溜溜地夹着尾巴逃跑了。校内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师生们的士气，大家反蒋抗日的情绪更加高涨。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宣传演讲。还深入到曲阜四乡向广大农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号召农民组织起来，走武装救国的道路。并在曲阜城北的书院村和城西北的林西一带组织了“农民抗日救国会”。在城东南乡建立了农民武装“小刀会”等。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平津等地的学生掀起了南下请愿、敦促蒋介石抗日的高潮。二师党支部、学生会组织了南下请愿指挥部，还成立了宣传组和外交组，选拔了三十多名学生

组成敢死队。并且联络了兖州乡师、济宁七中等鲁南七校的爱国学生组成了一、两千人的南下请愿团。

十二月中旬的一天早晨，二师的四、五百名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浩浩荡荡向兖州进发。到了车站，由外交组向站方交涉车辆，站方不许。不一会儿，一辆从北向南开的特快列车路过兖州车站。在学生党员牛振清指挥下，敢死队的学生马上冲过去卧在铁轨上，其余的同学也都先后趴在了铁轨上。那时正是农历十一月间，身上冷风刺骨，身下铁轨如冰，不少同学冻得颤抖着，但大家抗日救国的赤诚之心却是火热的。列车终于喘着粗气被迫停了下来。宣传组的同学马上奔进车箱向乘客们慷慨陈词，宣传南下请愿的目的意义，乘客们被同学们无私无畏的救国热忱所感动，纷纷下车，让同学们乘车南去。请愿的队伍涌进了车箱。这是一列挂有“万国邮车”牌子的国际专列，站方怕引起国际纠纷，要同学们下车。双方僵持不下，铁路交通被迫中断。国民党反动派虽然抗战畏敌如虎，望风而逃。但对待手无寸铁、请愿抗日的青年学生却气壮如牛，如临大敌，派了满载武装军警的装甲车来恐吓镇压。学生们认为抗日无罪，救国有理，毫不畏惧。向军警们高呼口号：“革命的士兵们要和学生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救国！”、“调转你们的枪口，对准你们的长官！”，并在装甲车上贴上了“打倒蒋介石！”、“拥护苏维埃！”的标语。停了一、二天，其他学校的学生都相继回校，车站上只剩下了兖州乡师和我们二师的学生了。这时平津和济南请愿的学生从南京带伤而返。在兖州站与我们会师了。我们与他们在车站上召开了会师大会。我当时是负责和他们联系的代表之一。南下的学生愤怒揭露了蒋介石卖国求荣、血腥镇

压请愿学生的罪行。大家听了更是义愤填膺。口号震天。高呼“打倒卖国的蒋介石政权！”派来镇压我们的军警吓得溜走了。回来的同学们说：不要再南下请愿了，蒋介石已对我们下毒手了，请愿已经失去了作用，今后要改变斗争的方式。济南的代表对我们说：我们回到济南后给你们来信，咱们一起去砸国民党省党部。我们欢送他们走后，随即也返回了学校。

曲阜二师的卧轨斗争，震撼了鲁西南大地。曲阜、兖州等几个县的国民党县党部联合向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控告张郁光校长，说二师有共产党在活动，张校长唆使支持共产党闹事，二师赤化了等等。国民党省党部准备去二师捕人，张校长一个在省党部的亲友向他透露了消息。他立即派人把任白戈等老师送走，又通知程照轩、夏天庚等我们七、八个人，到城西犁华店李杰同学家中躲避起来。直到捕人的走了之后，我们才返校。

不久，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宣布把张校长撤职查办，临时军法会审委员会几次传讯，张校长均未到案。伪省政府下令通缉，张校长遂逃亡日本。后来，他回国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聊城范筑先部党代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在抗击日寇时与范筑先将军牺牲于聊城。

一九三二年初，国民党省党部委员杨书田接任二师校长。他带来一批国民党党棍和特务，冒充学生，安插在各个班级，借以监视进步学生的活动。他们还独出心裁地给每个同学编上号码，每个床头挂上名牌。这时二师的环境变得严酷了，斗争也更加尖锐复杂了。但党的组织如在陡峭悬崖石缝中生长的小树，尽管环境险恶，仍在成长、发展。党员人

数增加到二十多人，党支部改为特支，下辖曲阜明德中学和聊城三师两个支部。一九三二年二月，由夏辅仁介绍，我加入了共青团。到了三月，我与孟宪禹、李杰三人建立了二师第一个团小组。我任组长，先后发展了倪培荣、汪笑朋等同学入团。同学们在党的领导下，经常与杨书田等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如训育主任孟心平，经常向同学们讲苏区“赤化”的话，来攻击谩骂共产党，同学们就画了他的漫画，名之曰“赤化脸”。大家一见面就喊他“赤化脸”，他气得没有办法，就老实得多了。历史教员在课堂上污蔑说苏区的共产党强奸妇女，同学们就当众问他，你的家就在苏区，你姐姐、妹妹、妈妈现在怎么样了？这样一问他张口结舌，无地自容，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在课堂上胡言乱语、信口开河了。

这个时期，由于受“左”倾路线的影响，党的活动不善于隐蔽，力量过于暴露，特别是“九·一八”后，学校党组织几乎公开化，所以杨书田到任不久就掌握了党的活动及组织状况。一九三二年五月一日那天，在党的领导下，学生会召开了纪念大会，会上进行了抗日反蒋的演讲，高唱了《国际歌》，并上街游行，声势浩大，规模空前。杨书田豢养的一班特务，把二师党的活动报告了国民党省党部。五月二十日深夜，韩复榘派手枪旅到曲阜二师抓人，当时每个学生宿舍门前都站着一名训育员，手里拿着名单和手电筒。他走到我床边，问我是不是管毓筠，我一看便知道事情不好。这时，我想到我床头下面有党的秘密文件，收拾已经来不及了。我是在黑暗中一伸脚把它蹬到邻近的一个老乡同学床上，他问我干什么，我说睡懵怔了。接着上来两个当兵的，把我按在床上捆了起来，带到校部一看，程照轩、夏天庚等党员学生都

陆续抓来了。元善青同志由于身上长疥，同学们嫌他有味，那夜他找地方睡觉去了，才没被捕。当夜共抓了师生二十多人。

天亮以后，反动派把我们用绳子绑成一串，押往姚村火车站。我和程照轩并排绑着。临行时，刘弄潮老师对大家说：“走在街上要雄赳赳、气昂昂的，不要低头！”出了校门，我们一行人挺胸抬头在曲阜大街上走过，老百姓都用同情和敬佩的目光目送我们远去。在从曲阜古城押往姚村的路上，我们慷慨激昂，感奋万端，集体作诗一首：

“伟大的一九三二，难忘五月廿。

苍茫的曲阜古道，排印着多少罹难者的足迹！”

我们被押解着，步行十八里，到了姚村火车站，韩复榘派来的一列铁甲车早在等候着。随即我们就被押上火车，往济南开去。

到了济南，在从火车站去省警察局看守所的路上，我们一行人照样步伐整齐，气宇轩昂地走着，路上的行人都投以惊异的目光。在看守所里，敌人把我们分开，单个关押。捕共队、军法会审委员会对我们轮番刑讯。那年我才十七岁，被捕者中年令最小，他们就拿我开刀，妄图在我身上打开缺口，但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他们讯问我时，我说什么也不知道，弄不清你们抓我来干什么。他们恼羞成怒，气极败坏地打我。看守所中有个老法警是泰安人，他听说我是新泰人，与我认老乡。他说你年纪不大，很有骨气，就得这样。我教给你个法。他说：“一问三不知，神仙治不得。”我认为很好，就把他写在纸上，躲过敌人的岗哨，把它递给了另一间牢房的夏天庚。夏天庚比我大两岁，他看了，

在后边添了两句：“肉是他们的，骨头是自己的。”他又递给我，我又送给了另一间牢房的程照轩，他看了又在后边添了一句：“最后胜利是我们的！”便又塞给了我，我看了斗争的意志更加坚强了。

那时，我家里很穷，我吃的很差，穿的很脏，又没有钱。与我同牢的人都是些刑事犯。他们看我年令小，受刑又重。对我很同情。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非常残忍，每次审人都是在深更半夜进行，我每次受刑后都是到天很晚才回来。他们不睡觉，等着给我包扎伤口，给我服海洛英（鸦片，一种麻醉剂），好让我能睡着觉，减少疼痛。我感谢他们时，他们说：你们不是为个人吃的苦，是为整个劳苦大众受的刑，你们受刑光荣，吃苦头值得。

那时，我们十几个人，住在一间小牢房里，地很潮，铺的草湿漉漉的。屋里跳蚤乱飞，马桶味难闻，非人的生活令人难以忍受。敌人的审讯是车轮战术，轮番讯问。严刑拷打更是家常便饭。我身上整天是新伤痕接着旧伤痕，每次受审都被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疼痛钻心。

革命情谊比海深。在狱中，夏天庚把我当做亲弟弟看待。他姑父是个中学教员，经常往狱中给他送点钱和衣物。每次他都分一些给我。有一次他家里送来十块钱，他躲过狱警，用带着手铐的手捧着五块钱送到我手里。

狱中的生活是艰苦的，斗争也是尖锐激烈的。程照轩、夏天庚等同志在狱中建立了党的组织，成了狱中对敌斗争的领导核心。在狱中短兵相接的对敌斗争中，不少同志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和洗礼，如在被捕前还不问政治，不是党团员的李介仁（又名李应屈，山东肥城人，原任鞍山市经委副主任，

现已离休。)同学,由于保存《托洛茨基传》被逮捕。他在狱中受到了党的教育,痛恨敌人的法西斯暴行,虽遭受严刑拷打,不向敌人低头,经受了严峻的锻炼和考验,在狱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当时担任我党县委书记的教师肖寄语(编者注:据管戈同志回忆,三一年时曲阜就有我党的县委,设在二师里,肖寄语是任白戈和陆建平同志发展的党员,当时任县委书记。),因贪图个人安逸和享受,与二师五级外号叫“大花船”的女生恋爱,陷入情网,而叛变投敌。出狱后,失魂迷茫,写下了记述他恋爱经过的《曲阜》一书,而臭名昭著。当时担任团委书记的裴康增,也因其担任国民党省党部小头目的叔父劝降,而投敌叛变。裴康增投敌后,他为了向反动派邀功求赏,向我劝降说:你年纪轻轻,要适应低潮形势改弦更张。他甚至采取了流氓无赖的伎俩说:我是你的入党介绍人,我已经承认了,你快承认吧!我说,你大概记错了吧?他恼羞成怒骂我不识抬举,他说,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你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不干共产党,可以上大学;一条是死不回头,枪毙!他问我走那一条,我说我那条都不走。他听了气极败坏地说:不承认,也可以,走着瞧吧!他便与我法庭对质,硬说他是我的介绍人,我死不承认,刑罚更严酷了。一个大热天的中午,他们强迫我在院子里,面对着太阳,跪在砖上,两手高高地平举着一根木棍,稍微一动,他们就用皮鞭没命地抽我,还经常把我和其他判死刑的犯人一起拉上刑场,陪着别人枪毙。总之,在狱中任何酷刑面前,我都没向这些魔鬼屈服。

后来,由于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据理力争和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国民党反动派被迫撤销捕共队和军

法会审委员会，把我们转到军事法庭审判。他们在没有任何口供的情况下，给我判了刑。判决书上写道：该犯系共青团员，人证物证俱在，拒不承认，极端狡辩，执迷不悟，判处徒刑五年。程照轩和夏天庚二同志看了我的判决书，因没我本人的口供，要我上诉。在那暗无天日的社会里，上诉又有什么用？我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度过了近四年的非人生活，终于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出狱。

出狱后，我回到了家乡新泰，在家乡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三六年）秋，我又回到曲阜二师读书，与曹宇光编在一个班。他思想进步，平时爱看有关抗日救国的书籍，我们经常在一块谈论抗日救国的问题，成了好朋友。不久我俩之间互相公开了党员的身份。当时周兰田也在二师上学。因曹宇光与周兰田都是泗水同乡，关系较好，通过曹宇光的介绍，我认识了周兰田。在交谈中得知，他原是济宁七中的学生党员，来二师后与组织失掉了联系。我和曹宇光给周兰田恢复了党的关系，三人建立了党的支部。我们还先后发展了一些党员，由于周兰田在济宁较熟，我俩还经常到济宁一带活动。三六年十月间，我们的支部扩大成特委，负责领导曲阜、泗水、兖州、济宁等学校的党组织。特委负责人是周兰田和我。这时二师党支部由朱启召同学负责，不少班级建立了党小组。这个时期，我们还没有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由于我的组织关系在家乡新泰，我就决定托新泰县委写信介绍到省委，好与省委接上头，取得省委的指导。在新泰县委介绍下，我到了泰安找到了省委联络员、泰安工委负责人孙汉卿同志，向他汇报了工作，接上了关系。

三六年时的曲阜二师，在国民党党棍杨书田的控制把持下，一潭死水，毫无生气，共产党的活动极其隐蔽，而国民党的活动更加猖獗。学校里复兴社、蓝衣社CC等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密如蛛网。不少学生的思想逐步法西斯化。特别是三六年冬“西安事变”发生后，这伙法西斯分子声嘶力竭地恶毒攻击污蔑共产党，谩骂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他们在张贴的标语上把张学良写成张学“狼”。放出蒋介石后，他们欢喜若狂，手舞足蹈，放鞭炮，开庆祝会，如醉如痴，丑态百出。我所在的班级就有三个学生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的成员。他们直接受杨书田的指令，监视进步学生的活动。

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本鬼子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方兴未艾，此起彼落。那时，我们在二师也领导了学校的抗日救亡运动。主要活动是：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开演讲会，停课上街游行，到农村宣传，唤起民众，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前方将士抗战负伤，我们开展募捐活动，组织学生到兖州慰问伤兵。为了便于党的活动，我们以组织英文、历史、文学等各种研究会作掩护，把进步的青年学生团结在党的周围。通过教育培养，及时把具备党员条件的青年吸收到党内来，把他们由革命的同情者改造成为革命同志。在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张贴标语时，杨书田豢养的特务就进行破坏。我们在前头贴，他们就在后边撕。每星期我们召集抗日演讲会时，他们就煽动、狂叫、起哄，并迅速把我们的活动情况汇报给杨书田。杨书田为了压抑我们，提出了三个不准（不准离开课堂耽误功课，不准公开集会，不准上街讲演、下农村宣传）。我们去兖州慰问伤员